

◆ 汤显祖研究丛刊 ◆

主编 叶长海

—— 郑培凯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驚夢

商調 遶陽臺

遶池遊

夢回鶯囀亂煞年光徧

高陽臺

汤显祖： 戏梦人生与文化求索

池遊 拋殘繡線

仙步步嬌裊晴絲吹來閒庭院
搖漾春如線停

◆ 汤显祖研究丛刊 ◆ 主编 叶长海

汤显祖： 戏梦人生与文化求索

郑培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汤显祖:戏梦人生与文化求索/郑培凯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汤显祖研究丛刊/叶长海主编)

ISBN 978-7-208-13540-6

I. ①汤… II. ①郑… III. ①汤显祖(1550~1616)-人物研究-文集 ②汤显祖(1550~1616)-戏剧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 ②I207.3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3555 号

特约编辑 赵天为
责任编辑 周 珍
封面设计 王小阳
版式设计 姜 明

• 汤显祖研究丛刊 •

汤显祖:戏梦人生与文化求索

郑培凯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 插页 6 字数 317,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540-6/J·434

定价 48.00 元

汤显祖与晚明 文化美学 (代序)

汤显祖(1550—1616年)是明代的大剧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突出,可与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相抗衡,是代表中国戏剧文学的经典大师。近年来更有一些研究者以汤显祖比莎士比亚,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这两位东西戏剧大师的成就,使得汤显祖的经典地位更为提升。

在20世纪的末叶,一提起汤显祖,只要有一点文学艺术修养的人就会想到《牡丹亭》,想到在舞台上仍然经常演出的《游园惊梦》一折,想到那脍炙人口的“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想到那令人心醉、令人着迷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近些年来,《牡丹亭》的情节与曲辞甚至经人脱胎换骨,成了话剧与电影的内在结构,也显示出,在今天大家的心目中,汤显祖最伟大的贡献便是《牡丹亭》的创作,在历史文化上奠定了他的经典地位。

当前的这种历史评价与看法,固然有道理,却和明清以来对汤显祖历史地位的评定有着相当的差异,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可以借此看出不同时代对历史意义的侧重有别,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历史评价发展的踪迹,凸显出今天的文化关怀取向。再进一步,了解了历史阶段性的文化价值变动,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评价标准,以批判的态度拓展我们衡量历史文化中艺术创作思维的意义。

汤显祖在《明史》中有传,见卷二百三十,强调的是他的政治生涯。通篇居然没有一句提到他的戏剧创作,唯一说到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这两句话:“少善属文,有时名。”传中却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引述了汤显祖批评时政而贬官的《论辅臣科臣疏》,显然是把显祖的历史地位放在直言急谏的政治举措上来考虑,完全忽视了他文学艺术上的贡献。

汤显祖,字若士,临川人。少善属文,有时名。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显祖谢弗往。懋学遂与居正子嗣修偕及第。显祖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迁礼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显祖上言曰:“言官岂尽不肖?盖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故言官向背之情亦为默移。御史丁此吕首发科场欺蔽,申时行属杨巍劾去之。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一言相侵,无不出之于外。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纵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贵矣。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微贿钜万;抵抗,日宴西湖,鬻狱市荐,以渔厚利。辅臣乃其报命,擢首谏垣。给事中胡

汝宁攻击饶伸,不过权门鹰犬,以其私人,猥见任用。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辅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谓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禄植善类,今直为私门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是人才可惜也;辅臣不越例予人富贵,不见为恩,是成宪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囂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乞立斥文举、汝宁,诚谕辅臣省愆悔过。”帝怒,谪徐闻典史,稍迁遂昌知县。二十六年,上计京师,投劾归。又明年大计,主者议黜之。李维桢为监司,力争不得,竟夺官。家居二十年卒。显祖意气慷慨,善李化龙、李三才、梅国桢,后皆通显有建竖;而显祖蹭蹬穷老。三才督漕淮上,遣书迎之,谢不往。显祖建言之明年,福建僉事李琯,奉表入都,列时行十罪,语侵王锡爵;言惟锡爵敢恣睢,故时行益贪戾,请并斥以谢天下。帝怒,削其籍。甫两月,时行亦罢。琯,丰城人,万历五年进士,尝官御史;既斥归,家居三十年而卒。显祖子开远,自有传。

清初修的《明史》,在正史传统中向来被誉为“四史”以来的良史,却因其意识形态的蒙昧,以政治权力与道德秩序为历史价值的考量基础,因此,汤显祖在历史文化上的地位也就缩减到了政坛斗争中的清流角色。

张廷玉挂名总纂的《明史》,基本上袭自万斯同的《明史》,汤显祖传也是从万斯同的著作中抄来的。然而,万斯同所撰的《汤显祖传》(《明史》卷三百二十六)虽然是以显祖的政治生涯为叙述主脉,却没忘了在结尾处带上一笔:“少以文章自命。其论古文,则谓本朝以宋濂为宗,李梦阳、王世贞辈,虽气力强弱不同,等赝文耳。识者黜之。”也就是说,

《明史》对汤显祖的评断,在变成“钦定”之前,虽未提及他的戏剧创作,却肯定他批判前后七子文学复古主义的见解,点出他在明代文学的“古文”主流脉络中是独树一帜的。

我们若是再往前溯,便会发现明末的文人学者,不但推崇他在诗文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与风格,也毫无保留地赞扬他在戏剧方面的才华与贡献,对汤显祖历史地位的揄扬主要是放在文化与艺术方面。钱谦益的《列朝诗集》中有《汤遂昌显祖小传》,在简述了显祖的生平之后,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在讨论显祖的性格风骨及其诗文戏剧的成就,明确展现显祖在文化创新上的贡献:

胸中魁垒,陶写未尽,则发而为词曲。“四梦”之书,虽复流连风怀,感激物态,要于洗荡情尘,销归空有,则义仍之所存略可见矣。尝谓:“我朝文字,以宋学士为宗,李梦阳至瑯琊,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赍文尔。”万历间,瑯琊二美同仕南都,为敬美太常官属。敬美唱为公宴诗,不应;又简括献吉、于鳞、元美文赋,标其中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流传白下,使元美知之。元美曰:“汤生标涂吾文,异时亦当有标涂汤生者。”自王、李之兴,百有余岁,义仍当雾塞充塞之时,穿穴其间,力为解驳。归太仆之后,一人而已。义仍少熟《文选》,中攻声律,四十以后,诗变而之香山、眉山;文变而之南丰、临川。尝自叙其诗三变而力穷。又尝以其文寓余,以谓“不蕲其知吾之所已就,而蕲其知吾之所未就也。”于诗曰变而力穷;于文曰知所未就。义仍之通怀嗜学,不自以为能事如此,而世但赏其词曲而已。不能知其所已就,而又安能知其所未就——可不为三叹哉!

钱谦益在评定汤显祖历史地位时,对他上疏遭贬之事,只简单地 说:“抗疏论劾政府信私人、塞言路。”对《论辅臣科臣疏》的内容,则只字未引。倒是对于显祖在诗文上的声誉为戏曲所掩,发了一些不平的感慨,认为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全方位,并不仅限于戏曲。钱谦益的传与《明史》的传是两个极端:前者强调显祖的文化艺术贡献,对他的政治活动毫不措意;后者只着眼显祖的政治生涯,甚至集中到影响万历朝政的《论辅臣科臣疏》,对显祖的文学艺术贡献视而不见。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说,钱谦益的传是为选入《列朝诗集》的诗人汤显祖写的,因此少谈政治;而《明史》的传要以国家大事为依归,所以不谈文艺。然而,无论我们怎么解释,正史的撰著有意排除汤显祖在文化艺术上的贡献,显示撰史者的泛政治偏颇心态,却是不争的事实。

假如说钱谦益是为诗人汤显祖写传,有其特殊的立论角度,不能作为明末最具代表性的全面看法,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与汤显祖同时代的邹迪光写的《汤义仍先生传》。这篇传记是在显祖生前就写成的,不能算是盖棺论定,然而,传记以显祖生平为经,叙述了他生活中出处进退的细节,倒是清楚反映了同代人眼中的汤显祖,除了嵒崎垒落、高风亮节,最让人钦佩的是他学殖富赡,又在文学创造上开拓了新天地。

《汤义仍先生传》叙述显祖生平,大体上分为五段。第一段从童年说到二十岁左右,说他天资聪颖,文章出类拔萃,弱冠就成了举人。在大家的心目中,他是个青年才俊:“彼其时于古文词而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籍、墨兵、神经、怪牒诸书矣。公虽一孝廉乎,而名蔽天壤,海内人以得见汤义仍为幸。”第二段写他不肯结交张居正,久困科场,到张居正死后才考得进士,又不肯夤缘权贵,自请到南京任职:“至则闭门距跃,绝不怀半刺津

上,摊书万卷,作蠹鱼其中。每至丙夜,声琅琅不辍。家人笑之:‘老博士何以书为?’曰:‘吾读吾书,不问博士与不博士也。’间策蹇驴,探雨花、木末、乌榜、燕矶、莫愁、秦淮、平陂、长干之胜,而舒之毫楮,都人士展相传诵,至令纸贵。”第三段写他在南京任职谨慎尽责,后来因上疏而遭贬徐闻,过了一段时间转任遂昌县令。第四段写他任遂昌县令时,提倡教育,与民休息,治绩卓著,后因看不惯政坛的争权夺利与政策的扰民,挂冠而去,没想到后来竟遭解职的处分。第五段写他退隐居乡,种花养鸟,闭门读书,完全不去结纳官府,却乐于助人,是光风霁月之典型。

邹迪光这五段叙述,虽然经常涉及显祖的政治生涯,却总是一笔带过,不赞一辞。如说到他上疏遭贬,只不过短短的几句:“谓两政府进私人而塞言者路,抗疏论之,谪粤之徐闻尉。”与钱谦益的传处理手法相同,显示同代人并不借此大作文章,并不认为这是显祖生涯中最值得记载的大事。倒是邹迪光在叙述完显祖生平之后,总结他一生的成就时,是这么说的:

公于书无所不读,而尤攻汉、魏《文选》一书。至掩卷而诵,不讹只字。于诗文无所不比拟,而尤精西京、六朝、青莲、少陵氏。然为西京而非西京,为六朝而非六朝,为青莲、少陵而非青莲、少陵,其洗刷排荡之极,直举秦、汉、晋、唐人语为刍狗,为馐余,为士苴,而汰之绝糠粃,镕之绝泥滓,大始玉屑,空蒙沆瀣,帝青宝云,玄涯水碧,不可以物类求,不可以人闻语论矣。公又以其绪余为传奇,若《紫箫》、《二梦》、《还魂》诸剧,实驾元人而上。每谱一曲,令小史当歌,而自为之和,声振寥廓,识者谓神仙中人云。

从邹迪光的传可以看出,明末的人对汤显祖在政治出处上的清守是非常崇敬的,但是他们更注意他在文化领域的贡献,说他人格如清风朗月,学问有宗庙之美,文章更是天青水碧、山远林深,可与造物比美。

综观明清以来对汤显祖历史地位的评价,可见:清初修史者只见到显祖在政治上的清流角色;20 世纪的人只强调他在戏曲上的成就,甚或只讨论一出《牡丹亭》,尤甚者只知道一折《(游园)惊梦》;倒是明末的学者文士理解得比较全面,对他政治生涯的取舍深表钦佩,对他在戏曲上的成就充分肯定,还对他在诗文方面的见解与创作大为赞扬。

*

*

*

在本书中,我尽量采取明末学者文人比较全面的态度,来探讨汤显祖对文化思想及文学戏剧艺术的贡献。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这种态度比较宽广,可以涉及当时的文化风气与氛围,呈现汤显祖艺术思维的背景与创新的取向,不仅仅把汤显祖作为剧作家来研究,而是把他当作文化与艺术的探索者,借着研讨他的探索方向来展示晚明文化的动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采取了这种比较宽广全面的态度,就必须先回到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去思考历史人物的情怀与关注,再做出我们思考历史文化意义的价值判断与定位。在方法论上,可以导向我这十几年来钻研的“文化美学”,也就是在探索历史文化发展的主次脉络时,专注文化意识史涉及艺术思维与创造的部分,以期通过此一特殊领域的材料及这些材料衍生的文化价值思考,来理解与评定历史文化发展的意义。

我提出“晚明文化美学”一词,并不是说晚明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已经充分了解到这个文化思维领域的存在,已经自觉地在拓展与扩充艺术创作的历史文化意义。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他们不自觉的努力,以及灌注了许多心力才创造出来的材料,因为正是由于这些新创的文化

资源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影响、流传与累积,才让我们到了20世纪末,经历了西方学术文化思考的洗礼,蓦然回首,竟然发现可以称作“文化美学”的这个领域,从晚明以来已经逐渐浮现。

要探讨晚明文化美学,是件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因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特定的研究题材,而是有待拓展的一片莽莽苍苍的研究领域;这不是学院式哲学美学研究的分支,也不是文学批评强调文本研究的延伸,更不是艺术社会学对文艺作品在社会结构与功能运作中的作用所进行的分析。

我们在探讨晚明文化美学时,不但要深究**艺术成品与艺术创作思维的关系**,涉及创作者的主观意图与作品的客观艺术呈现之间的错综复杂层次;要探讨**艺术成品与社会接受的互动关系**,涉及艺术创作与读者或观众的参与和欣赏理解的问题;还要探讨**社会接受的历史文化基础与创作者的艺术思维过程及创新导向之间的关系**,涉及艺术创新不只是发明艺术新花样,而是在文化创造与更新过程中发掘新意义。这一切探讨的方向与取向,都要有一个**核心精神**贯串其中,那就是**历史意义的追求与文化价值的关怀**。

以历史文化作为探索知识的精神基础,绝不是狭义的历史主义或“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而是对人类生命集体与个体的实存经验进行人文反思。首先要肯定的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是人们生活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整体感受,以及通过艺术的创作与升华所展现与发掘的生活实存意义(或无意义)。我所谓的“文化美学”,着眼点是放在**有实存人生经验的人间**,而非倾向于宗教超越的神界,也不是附丽于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道德秩序之上。

具体落实到研究汤显祖与晚明文化的关系,我们就要问:汤显祖为

什么要进行文学与戏剧艺术创作?难道只是因为社会习惯如此,凡是文人学士都要作诗填曲吗?再进而追问:汤显祖为什么要创作某些题材的作品?为什么会创造出某些性格鲜明突出的角色?他在自觉地发掘历史文化处境中的重大人生课题吗?还有,他为什么对自己的艺术作品采取如此严肃的态度,特别是对待戏剧作品,强调演出时“一字不能易”?难道只是文人的酸气,敝帚自珍吗?从当时士大夫文人的历史环境来看,则汤显祖出身阳明学派,是泰州大师罗汝芳的嫡传弟子,又是文名满天下,他是怎么看待自己在文化学术师承上的地位的?而身负文化界的如此清望,他为什么要在士大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上付出如此巨大的心力?难道只是个人的偏好,与时代变迁的文化动向无关吗?

本书所收集的诸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些问题,同时也在探讨的过程中,对“文化美学”研究取向的历史意义做了一些批判思考与自我质疑。对汤显祖作为晚明文化美学的拓荒代表,我首先要问: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晚明)有什么意义?从今天回顾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来看有什么意义?从我们批判、继承与创造文化的前瞻展望角度来看有什么意义?在思考这些不同时段的历史意义之际,还要记得,艺术创作与思维有其相对(当然不是绝对!)独立的领域与范畴,也有其相对独立发展出来的内在价值,因此,我们在探讨汤显祖的艺术创作与思维时,也不会因其外缘的历史文化关连,忽视其相对独立的内在机制。从表面上看来,我们的讨论方式,似乎摆荡在强调外缘关连的宏观历史架构与强调内在艺术形式的普遍理论系统之间。其实,我们希望做到的,是汲取二者之长,而能超越“架构”或“理论”对实存人生经验与意义的武断压模,展现艺术思维在具体历史生活中所能够翱翔的想象空间。

假如历史文化不只是马克思所说的附丽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不只是福柯所说权力结构知识论说所撒下的弥天盖地的网罗,不只是德希达为了许诺明天的思维空间而必须解构的对象,而能提供一些资源,作为我们追寻思维自由、实存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根基,则过去的艺术思维与创作就一定是最可宝贵的材料了。循着这样的脉络来思考,我们当然不能只是为了思辨的方便(甚或是偷懒),随意应用西方的宏观文化理论架构,或自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艺术普遍形式探讨系统,来硬套中国传统艺术思维与创作的材料,而必须先从具体的文化艺术材料出发,细致探讨这些材料的内在机制与外缘关连,才能见微知著,展现其历史文化的开拓意义,不至于流于夸夸其谈。

《汤显祖、赵邦清与晚明政治》,借着探讨汤显祖与赵邦清的交谊,展现汤显祖生活的万历年间政坛纷争与纠葛的实相。对照汤显祖与赵邦清在地方与中央两级所面临的人生处境与选择,我们不但看到汤显祖的切身经历与感受,还看到他对赵邦清经历类似处境的观察与反省。这种对人世的敏锐感受与冷静观照,使他对自己人生道路有一种明澈的认识,并能推己及彼,对儒家传统的修齐治平轨范有所超脱。汤显祖绝意政治,并不表示他对社会政治改良完全绝望,而是对于自己生命主体的意义非常珍视,是一种“培元葆真”的选择。从他任遂昌县令,到写完《邯郸记》这十年期间,汤显祖对于自己以至于推广到一切人,是否应当经历政治生涯以达到经世济民的理想,态度是游移暧昧的。也就在这段期间,他完成了《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这“临川四梦”。在本篇中,我探讨了汤显祖的生活经历如何影响他的人生选择,如何提供生活素材让他进行艺术想象,同时也指出,他的想象空间是远超过社会政治背景的有限范围。这里牵扯到的是历史现实与艺术

想象的错综复杂现象,汤显祖的艺术思维与创作过程,让我们看到其间“不即不离”的辩证关系。

《〈牡丹亭〉的故事来源与文字因袭》,基本上是篇考证文字,以明确的资料证据,展示《牡丹亭》故事前三分之二是源自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的,其后三分之一则从《睢阳王收考谈生》故事取得灵感。其实,汤显祖本人早就在《牡丹亭记题词》一文中透露了消息,并没有任何隐瞒。只是近代学者被“文学独创性”(讲得铜臭一点就是“知识产权”)的观点所误诱,总以为文学艺术的经典之作必定是戛然独创,如天马行空,无所依傍。本篇详列《牡丹亭》因袭《杜丽娘慕色还魂》的文字,就是要指出,汤显祖从他人的著作中取得了艺术创造的资源,不但有所提升,还出现了质变的飞跃。《牡丹亭》故事不是汤显祖独创,丝毫无损于《牡丹亭》的文学经典地位,就像莎士比亚,几乎每一出戏都有所承袭,也丝毫无损莎士比亚在文学艺术创作的成就与地位。

《汤显祖的文艺观与〈牡丹亭〉曲文的艺术成就》探讨了明末文艺思潮的发展与阳明学派中的泰州学派的关系,最具体的就是罗汝芳与李贽如何影响了汤显祖的艺术思维与创作。从阳明学的“致良知”到罗汝芳的“赤子良知”与“天机泠如”,再到李贽的“童心”、“真心”、“本心”的“绝假纯真”,就已经可以看到一种新的艺术思维取向,预示了汤显祖塑造杜丽娘的“情至”与“情真”的形象。这样的探讨,扩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更可明了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时的艺术思维主脉,不只是停留在“爱情主题”之上,还有更深远的历史文化关怀。具体说到曲文的创作,则《惊梦》(即《游园惊梦》)一折就不只是描写“小姐丫头逛花园”,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象征层次,让我们听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之时,不但会想到人生实存的意义经常虚掷,还会想到文化传统

可能是在扮演着消磨人生的功用。因此,汤显祖在《牡丹亭》中耗尽心力惨淡经营出来的“肠断句”,就传递着不同层次的意义与消息,在戏剧情节进行中,着意展现杜丽娘的内心变化,并由这些精微变化的提升与诗化,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歌咏理想与幸福的追寻。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汤显祖曲文的辞藻是与情节发展(特别是象征层次)息息相关的,而不只是作诗填词式的文字功夫。这也就是他强调自己作品中有“意趣神色”的考虑,不能随便改动曲辞的主要原因。

《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牡丹亭〉与〈红楼梦〉在社会思想史层面的关系》,环绕着两个主题探讨《牡丹亭》与《红楼梦》的关系,一是晚明以来“情真”观念的发展,特别涉及与道德秩序的冲突;二是明清时期士大夫对妇女的态度在文学中的反映,并涉及社会接受的反响。本篇明确指出,曹雪芹的看法直接源自汤显祖,并指出脂砚斋评与曹雪芹的作者意图有时并不合拍。

《解到多情情尽处——从汤显祖到曹雪芹》,一方面继续上篇的探讨,集中在《南柯记》与《邯郸记》创作意图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关系,另一方面突出讨论汤显祖受到佛家出世超越影响,企图借着戏剧创作挖掘“情多”与“情尽”的关系,直接影响了曹雪芹《红楼梦》的超越主题。我在本篇中特别指出,汤显祖与曹雪芹对“度化主题”的处理,不单纯是处理一个孤立的艺术主题,而是通过艺术思维与创作,探索人生实存的意义。假如人生的具体经验告诉我们,“情至”、“情真”会转为“情多”、“情毒”,直接联系到佛家烦恼障的贪瞋痴,则如何超脱俗世牵挂,就是汤显祖受了达观和尚影响之后的主要思索方向,而曹雪芹的人世经验也引导他去思考精神超越主题。然而,无论汤、曹两人是如何向往“月中无树影无波”的境界,他们却因为对于艺术创作的意义不能忘情,

超脱不了文字业,而为我们留下了伟大的文学作品。

《汤显祖与达观和尚——兼论汤显祖人生态度与超越精神的发展》,把汤显祖的艺术思维与创作放在他一生追寻生命意义的脉络中来思考,对罗汝芳、李贽、达观对显祖的思想影响做了简要的总结定位。本篇特别分析了达观的思想,锁定他对“情”、“理”、“梦”等观念范畴的解释,并探讨了达观的看法是如何影响了汤显祖,同时厘清了过去对汤显祖晚年思想变化的一些误解。

本书的写作时间跨越了十五个年头,不可谓不久。但是,慢工并没有出细活,因为主要的论点都是十几年前的。还有三篇相关的论文,因为是从英文转译的,转译过程中必须改写,就一发不可收拾,只好将来自立门户,别出专著了。这三篇论文分别是:《青年汤显祖的思想发展》、《世间只有情难诉——汤显祖与女性自主意识的发展》、《汤显祖、董其昌与晚明文化美学的探寻》,列在这里,也算是对自己的交代。

*

*

*

在本书中,我虽然花了很多的篇幅征引汤显祖的诗文,也对一些诗作进行了解析,然而却没有别立篇章,具体讨论。由于汤显祖的诗文在明代文学中独树一帜,有其突出的艺术成就,值得在此一提,虽然无法细说,但至少要点出明清之际学者文人对显祖诗文的推崇,以及他发展独特风格的时代意义。

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钱谦益《汤遂昌显祖小传》,就明确指出,汤显祖对明代文学风气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前后七子的文章是“赝文”,认为他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主张,只是没有创意的模仿,自己是不屑于去跟随的。钱谦益还特别称誉显祖的文章,“归太仆(有光)之后,一人而已”。并点出他的诗风由魏晋《文选》的辞藻转而接近

白居易、苏东坡一脉,他的文风则转而接近他家乡的文学前辈曾巩与王安石。钱谦益的赞誉,其实还暗含了一层意思没说透,但却是明末清初学者都心知肚明的,那就是汤显祖是晚明最早、最明确反对文学复古主义的人物,其历史意义的重要绝不下于后来的公安三袁。

钱谦益说的显祖与王世贞及王世懋一段过节,到了清初居然传讹了,变成王世贞去拜访汤显祖,显祖故意不见,还要使王世贞难堪,让他看到几案上批评的文字,扫兴而去。施闰章的《矩斋杂记》中有这么一段:

弇州艳义仍之名,先往造门。义仍不与相见,有所评抹弇州集,散置几案。弇州信手翻阅,掩卷而去,无他言。此见《列朝诗集》义仍传。山史王氏曰:义仍过矣,抑何弇州之宏也。余闻弇州,君子也,太仓人至今称其德不衰。即使文有不合如义仍者,当因其来而与之欢然相接,以徐致其切磋之谊。义仍处之若此,毋亦失礼乎!予谓牧斋欲訾弇州,而适著其美;而其美义仍也,君子以为犹诋也。

这里批评了汤显祖的态度,称赞王世贞的豁然大度,却根据的是无中生有的故事。钱谦益《列朝诗集》的显祖传,只说到王世贞、世懋两人在南都服官,显祖是王世懋的属下,却不愿意参加王氏兄弟所领导的文学唱和集团,并且标出复古派抄袭模仿古人诗文之处,表明他不赞同的态度。的确,汤显祖不肯讨好上司,甚至还透露他不屑为伍的态度,是有点过于狂傲,但同时显示他高自清标的耿介性格。到了施闰章与王山史的笔下,居然成了侮慢长者的文艺青年了。不过,至少反映了一个历